

新疆文史



第一辑

1984年4月

5
250.6
9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史研究馆

发 刊 词

《新疆文史》第一辑出版了。

新疆文史研究馆是一九八一年成立的，征集和整理文史资料工作今年才开始。由于处在初创阶段，人手少，困难多，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刊物，也就难免草率和粗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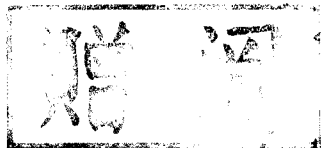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曾提出：“戊戌以来，是中国旧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录下来。”新疆文史馆的馆员，大部分年逾古稀，他们经历了几个历史时代，对新旧社会感受很深。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在一派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他们为了报答党的关怀，积极响应周总理生前的号召，在垂暮之年，努力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并积极组织稿件，整理编辑新疆文史资料，为教育后代，为发展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新疆文史》的编辑刊印，在于保存积累资料及推动资料征集工作。趁《新疆文史》第一辑出版之际，我们吁请各方面予以支持和帮助，热切希望有识之士撰寄稿件，举凡新疆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外事以及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都是我们所欢迎的。

存真求实，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原则和指导思想。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讲真话。封建时代，那种“隐恶扬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作法，是对历史的歪曲，这种态度是我们不能采取的。当然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对同一历史事件，也可以根据各自的史料来源实录，以便相互印证，广泛讨论，有利于存真去伪，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由于我们业务水平低，错误失实之处，尚望来信来稿指正。

B571123



发 刊 词

《新疆文史》第一辑出版了。

新疆文史研究馆是一九八一年成立的，征集和整理文史资料工作今年才开始。由于处在初创阶段，人手少，困难多，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刊物，也就难免草率和粗糙。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曾提出：“戊戌以来，是中国旧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录下来。”新疆文史馆的馆员，大部分年逾古稀，他们经历了几个历史时代，对新旧社会感受很深。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在一派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他们为了报答党的关怀，积极响应周总理生前的号召，在垂暮之年，努力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并积极组织稿件，整理编辑新疆文史资料，为教育后代，为发展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新疆文史》的编辑刊印，在于保存积累资料及推动资料征集工作。趁《新疆文史》第一辑出版之际，我们吁请各方面予以支持和帮助，热切希望有识之士撰寄稿件，举凡新疆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外事以及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都是我们所欢迎的。

存真求实，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原则和指导思想。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讲真话。封建时代，那种“隐恶扬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作法，是对历史的歪曲，这种态度是我们不能采取的。当然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对同一历史事件，也可以根据各自的史料来源实录，以便相互印证，广泛讨论，有利于存真去伪，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由于我们业务水平低，错误失实之处，尚望来信来稿指正。



B

084102

回忆杜重远先生在新疆

崔景福

杜重远先生系东北吉林省人，身材高大魁梧，知识渊博，谈吐流利，举止不凡。一九二一年留学日本时，与盛世才是挚友，盛在日本经济拮据，杜曾予以很多资助。

一九三七年前后，杜先生多次来新疆，并在《抗战三日刊》上发表过《三度天山》的文章，对盛世才在抗战大后方的作为有很高的评价。他还写了一本《盛世才与新新疆》的小册子，在内地印行，宣传盛世才在新疆推行“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建设抗战大后方，倾向进步等等……。一九三八年冬季，应盛世才特邀，杜先生携全家来到新疆。

（一）

杜先生到新疆后，盛世才亲自任命他为新疆最高学府新疆学院院长。当时，新疆省教育厅也不能干预新疆学院的教务工作。杜先生的前任，是林基路教务长（调南疆工作），院址是在南梁一座破旧的军营内（现在第三医院对面）。学院设治经济系、教育系、理工系、土木工程系、语言文学系，并附设高中文科、理科及民族班。学生三百余人。到一九四二年春院址迁至新大楼（现在新疆大学中间的一幢红楼），后又增加农牧系。

在杜重远任新疆学院院长时，先后来新疆的名人很多。如：沈雁冰（茅盾）、张仲实、萨空了、沈志远、史枚、史杰、赵丹及其爱人叶露茜、徐韬及其爱人余佩珊、王为一、朱今明、易烈、鲁少飞、高韬、涂治、江豪等。这些人大多在学院任过教。沈雁冰的儿子及杜重远的内弟侯立达都在学院读过书。还有一批从南方来的学生多数是土木工程系的。这些人到遥远的新疆来工作，来上学，与杜先生写的那本书的宣传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其中也有应杜先生的邀请和介绍来新疆的。

杜任院长后，一直遵循林基路教务长提出的“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与师生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先生平易近人，受到了全院师生的衷心爱戴和尊敬（当时的教务长是中共党员郭慎先）。

杜院长住在学校一间破旧的房子里。房间只有几件简单的家俱，却堆满了书籍报刊杂志等。他每周星期六回家，星期日晚上归校，严格遵守学院的制度。学生每天要集合上早操，并有早自习、晚自习。杜先生与学生同时作息，甚至熄灯后还要查夜，每天工作生活安排得很紧张。他很重视学生的日记，并亲自批阅。深夜，透过他的窗子，经常可以看到他在聚精会神地批改学生日记。每当我回忆杜院长用红铅笔签阅我的日记所写的批语时，那些字迹犹历

历历在目。可惜这些日记，特别是有他亲笔批语的日记，在“破四旧”与挂牌游斗的高潮中我都悄悄烧毁了，这实在是一个重大损失。

杜先生很重视报刊的发行。当时学院由他亲自主编的《新芒》月刊，内容很丰富，不少名人作家和学院教师为月刊撰稿，茅盾先生就在《新芒》上发表了一篇有关“五四”运动的文章。月刊由新疆报社印刷，在广大学生及群众中是比较受欢迎的。

杜先生很重视每星期一早晨的全学院周会。会议由他主持，并作讲演。他讲话通俗易懂，既流畅，又实际，因此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一次因有几个学生不遵守学校纪律，经再三批评教育，仍不改正，为此他恼火了，一气之下，他讲了他来新疆的整个过程以及到新疆后督办让他当官等等。大意是：我的老家在东北，那里我有很大的工厂，资本很雄厚。我是个大民族资本家。我与盛督办在日本留学时期，曾一同搞过抵制日货的运动。督办在日本一度经济有困难，我也资助过。“九一八”事变后，我流亡到内地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随后应督办的邀请，来到新疆。我这个人，从不为个人的名利打算。我非常热爱和尊敬我们的抗日爱国的领导者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先生们。我渴望国富民强。为了抗日救国我在上海主办了“新生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几乎丧了命。我坚决主张全国各党派联合起来一致向着抗日救国、振兴中华民族的路上走。我支持共产党的主张，但我并不是共产党员。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所以我更不是国民党员。我深知盛督办在抗战大后方执行“六大政策”对前方能起很大的作用，所以我愿来新疆给中华民族做些事情。我决不为做官、发财、享受来新疆。我来新疆之后，督办曾让我当省政府副主席（我想这话不会是假的，因为在校的学生中，有盛世才的密探李英奇的儿子李树祥，有盛的堂弟世华、世杰，还有他的小特务），经我谢绝后，督办又让我担任教育厅厅长（当时教育厅长是孟一鸣），我仍不接受。后来督办问我，愿干什么工作，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我衷心愿与青年学生打交道，交朋友。因为他们有朝气，有勇气，有活力……。”这样我才决定到这里来的。尽管这样，督办以后还是让我和沈雁冰及张仲实先生担任了新疆最高的名誉政治顾问。讲到这里，他语重心长地接着说：“同学们！好好想想，我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一句话，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们青年人又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呢？我衷心地希望每位同学都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接着他又提高了嗓音说：“我还要向同学们坦率地再说一次，有人说我是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但我同情共产党。我还告诉大家，我更不是国民党，因为我痛恨国民党反动派。我坚决主张爱国家、爱民族，建设康乐富强的新中国。”他的讲演异常激动人心，受到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这次讲演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回忆起来，言犹在耳。

杜先生当时在新疆青年学生中颇有声望。在一次盛世才亲自主持召开的全市人民群众大会上，杜、沈、张以最高政治顾问身份与盛坐在主席台上。盛世才请杜先生以政治顾问的身份出面讲话。杜先生的讲话被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所中断，气氛极为热烈。

（二）

一九三九年夏，杜先生为了在全疆更广泛深入地宣传抗日救国和“六大”政策，利用暑假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暑假工作团”，由他自任团长去伊犁。沿途经昌吉、呼图壁、绥来（玛纳斯）、乌苏、精河等地，都开展了宣传活动，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到达伊宁，宣传团受到了伊犁行政公署姚雄行政长等官员们的热烈欢迎。宣传团住在伊宁沙河子中学，在操场搭起了临时舞台，每周公演几次自编的文艺节目，如小型话剧、大合唱、音乐歌舞等，很受各族群众的欢迎。

有一次晚会，节目安排很少，主要由杜先生讲演。杜先生慷慨激昂地讲解全国人民应该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并强调“六大政策”在抗战大后方所起的重大作用。他的演说博得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讲演时有维文翻译）。观众比平时多一倍。会中，天气骤变，风雨交加，尽管如此，群众仍坚持到底，最后高呼口号，在热烈掌声中散了会。杜先生在伊犁受到群众如此热烈的欢迎和尊敬，声望之高就可想而知了。但谁能料到，在伊犁之行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坐镇在迪化的盛世才所掌握、所了解。更甚者是姚雄行政长在一次专为欢送以杜先生为团长的全体工作团人员的大会上，在杜致答谢词之后，主席台上领着呼口号的人，竟然在呼完“盛督办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之后，喊出声“杜重远先生万岁！”的口号（此人当时这一举动，是出于什么心情，至今很难得出结论）。当时杜先生的神态、表现极为忐忑不安，因为在当时的新疆境内，各地不论举行任何大中型集会时，只能听到一个万岁的口号，即：盛督办万岁！这对杜来说，他是很敏感的。而且大部份参加会议的人，都表示出一种心情相似的恐惧神情。正因为这样，杜很谦虚很恳切的解释说：我杜某绝没有这样高的身价，更不能与督办相提并论，“万岁”这两个字，决不是随便对任何人都可以乱用的，我们要用在“中华民族万岁！”“盛督办万岁！”上。

（三）

从伊宁返回迪化途中，仍开展了许多宣传活动。特别是在精河县，由于天气炎热，苍蝇多，学生都不愿留，经过杜院长的耐心说服，大家就愉快地住下来，进行了两天的宣传，很受当地群众欢迎。

回校后，杜院长又积极投入了教学工作，处处为学生着想。他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质，并以身作则，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他最喜欢排球运动。为解决体育器材不足，他想各种办法到内地购置。一九四〇年元旦，他领导全院师生组织了一次滑冰表演赛，并亲自领队参加了全疆运动会。由于杜先生的热心倡导，学生们参加体育锻炼的热情很高，体育运动开展得很活跃。

不久，杜院长的身影在校内逐渐消失了。同学们都很关心杜院长，慢慢有了传说：杜院长的痔疮病很严重，不能到校了。当时学生会组织各班代表每周去杜院长家探望慰问。（杜的住处在现南梁长征电影院后面），其实是盛世才这个魔王对杜先生以“关心”“休息”为名，开始了第一步——软禁。时间不久，对杜先生的离职原因便有了更多的传闻。

有的说：杜院长在接电话时得罪和蔑视了盛督办。院长的电话由一位姓赵的河北老头专门看守。有几次杜院长正给我们讲课，赵老头气喘吁吁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报，报告……院长，盛督……办来电话啦！”杜院长示意听到了，说：“你不要那么大惊小怪的。”可是赵老头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还喊着：“院长！院……院长！是……督办来的电话呀！”杜很沉着的对赵说：“知道了，你对督办讲一讲，说我正在讲课，等一会请他再来个电话。”赵老汉只好提心吊胆地走了。这样的情况，在盛世才执政时确是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见不到的事。为此赵老头以后就说：“杜院长接督办的电话，不仅让等一等，而

且在通话时没立正，还坐在凳子上，并且不是毕恭毕敬，有时还争论几句。”听起来这是一件很有趣的小事，而实际上在盛世才的心目中，认为这是对他的莫大污辱，也是对他的极大不忠。有的说：在那次小教场的市民群众大会上，杜重远以新疆最高政治顾问的名义与督办在台上平起平坐，而且在杜的讲话结束时，在场群众的掌声长久不息，超过了盛督办的讲话鼓掌声，这些督办难道不记在心里，伺机整他？不然将来杜先生的威望岂不是超越督办之上了吗！有的说：新疆的刊物，已经有《反帝战线》、《新疆青年》，而且是督办同意并亲笔提名书写的，杜院长却偏偏又要办起一个《新芒》月刊，而且是杜院长自己负责主编并亲自书写刊名。这种做法，是和督办唱对台戏。有的说：杜院长的内弟侯立达对人说过：盛督办写的《六大政策教程》一书是杜先生起草的，督办只是挂了个名。有人说：督办和院长是故交，既是同乡，又同去日本求学，督办出于关心杜先生的健康，经过谈话，让杜院长告休。总之议论纷纷。

一九四一年春，盛世才制造了一个所谓以“杜重远为首”的“大阴谋暴动案”，什么汉奸、特务、暗藏的共党分子等大帽子都扣在杜先生的头上。杜先生被公开地逮捕入狱。

（四）

盛世才垮台前夕，我被关押在第二监狱的南院一号牢房（现中级人民法院内）。

一天号子里又关进一位年轻人。我让了位置，他便靠近我安睡了。由于怕来人是盛安插的特务，谁都不愿和他接近。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知道他姓杨（名字记不清了），绥来县人。逐渐熟悉了，才得知他入狱前是盛世才卫士队多年的小队长。从他那里，透露了许多盛匪暗杀惨案的内幕。接着我与他讲了杜重远是我上学时的新疆学院院长，又是我结婚时的证婚人是很敬仰的人。他便告诉我暗害杜重远先生一案的底细：

一天晚上，将杜重远先生从督办公署内的特别小监狱提出来，“请杜先生赴酒宴。”来到盛世才的小客厅。在坐的均系盛的心腹及最忠实的爪牙。盛满面堆笑地迎上来，喊道：“重远仁兄！重远仁兄！”并请杜坐入上席。开宴后，盛先假惺惺地说：“今天我们能与重远仁兄欢聚共饮，我晋庸（是盛的别名）感到万分惭愧，万分痛心，特赔礼致意，但也感到无比高兴。所惭愧的是我的老朋友重远仁兄在狱中受了委屈，也贻误了许多重要工作。而高兴的是今后大家仍能与杜先生一起，为建设新新疆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奋斗”。说着端起两杯酒，将一杯很礼貌地敬给杜先生，另一杯自己端起，在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地端起酒杯。盛说：“这第一杯为了杜先生早日康健，干杯！”在此场合下，尤其是盛世才亲自敬酒，谁能拒绝干杯呢？但谁能料到这是一杯毒酒啊！杜先生与盛碰杯后一饮而下。顿时，杜先生感到腹内不舒服，盛马上命令卫士将杜先生搀扶到另一客厅。盛又给杜先生一个削好的苹果，劝杜先生吃苹果以压酒。杜先生勉强吃了两口，腹内痛如刀绞，杜先生才知道盛对他下了毒手。（据说不但酒里有毒药，就连苹果里也注射了毒汁，一招不奏效再采取另一招）。杜重远先生以英雄气概怒斥盛世才，无情地揭露：“盛世才你是个地地道道的披着人皮的狼，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盛当即命令姓侯的军医“迅速抢救”，侯强逼着又给杜先生打了一针。顿时，杜先生七窍肛门出血，很快被抬出去。就这样杜先生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而献出了伟大的生命。

盛世才之所以要将杜先生杀害，原因是在四三年盛把杜的罪名又重新定为红色案，给杜先生戴了顶共产党员的帽子，好向蒋介石献媚邀功。另外也是怕重庆来复审杜案的王德溥回去报请蒋介石对此案有异议，故乘机先下毒手。

听了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同房的难友乔子光（原盛时期商业银行副行长）、张翻译等都以沉痛的心情哀悼杜重远先生，同时也更加仇恨盛世才残酷的法西斯专政。

邓宝珊先生对新疆辛亥革命的贡献

王 劲

邓宝珊先生，生前担任中央民革副主席、甘肃省省长。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逝世。他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人士，历史上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促成一九四九年的北京和平起义中曾起了重要作用。邓先生是一位民主革命的老战士，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时期新疆的伊犁起义。本文所记叙的，就是他这一时期的活动。

一、幼年失学，一怒从戎

邓宝珊先生原名邓瑜，字宝珊，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七日（农历十月十三日）生于甘肃天水城内忠义巷。兄弟三人中他行二。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家庭生活很困难，在读过短时间私塾后，便失学离家，前往兰州谋生。在兰州，他给一家药房当学徒，老板姓马。过了一年半，湖北新军杨缵绪（协统）部开赴新疆驻防，途径兰州招募新兵。当时邓宝珊先生恰好发生一件事：他因为给了一个要饭化子一些吃食，被老板娘一顿呵斥。他一怒之下便报名参加杨缵绪的部队，离开了药房。这时在一九〇九年夏秋，他还不满十五岁，虚报年龄为十八岁，由于他长得身材高大魁梧，因而被收编入列。

军旅生活开始，从兰州到伊犁几千里路的行程都从他的脚下一步步走过。他曾有过“面望玉门星斗稀，不是沙飞便是雪”的诗句，说明当时的行军是艰苦的。有时在沙漠中行军，鞋陷进沙窝里，行军的人精疲力尽，连拾鞋的力气都没有了。由于个性坚强，他克服了一切困难。后来他在诗句里记录了这段生活，如：

髫龄失怙走天涯，荆花憔悴惨无家，

马蹄踏遍天山雪，饥肠饱啖玉门沙。

一路上因各种原因士兵开小差的事时有发生，一些人因为难耐酷热和行军的艰难而动摇，可是邓先生不仅坚持行军，还鼓励和帮助同伴。当有人走不动时，他就背他们前进。在休息时，他还看书学习，和同伴结友，也彬彬有礼，因此得到大家喜欢。后来，邓曾不幸患严重的伤寒病，由部队交给一个道士看护。几剂草药，居然康复，他便又设法赶上部队前进

了。

这支新军到伊犁驻防后，他充当一名士兵。那时军队士兵中，认字的人极少，粗通文字的邓先生不久就被提升为司书。这时他决心发奋读书，买了一套《秋水轩尺牍》，业余请一位老师教读。这位老师一开始教他很认真，邓看见师娘取水困难，就主动给她挑水劈柴，坚持不懈，终于感动了师娘，给邓说了一些好话，从此老师教他就比较认真了，由此可见邓宝珊先生青少年时刻苦自学之一斑。不断的自学，使他在文化上进步很快。因而邓先生成年以后，文化修养已深，时人赠他以“儒将”的雅号。傅作义先生曾对人说：“古字画经宝珊兄评说，便声价百倍。”北京荣宝斋也经常请邓鉴别古物之真伪。这都与他早年在逆境中坚持学习是分不开的。

二、结交志士， 投身革命

在这段时间里，邓先生结识了杨缵绪的书记官金伯韬、张感生等人，金是邓的甘肃同乡；再经他们介绍认识了伊犁同盟会秘密组织负责人冯特民，他早在武汉便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因行动暴露，遭到清政府的通缉，被杨掩护于自己的部队中，充任杨部书记官，随军到新疆开展同盟会工作。冯特民因革命需要，便在新军内吸收陕、甘两省可靠人士为同盟会成员，以壮大革命力量。邓先生与冯特民等人交往后接受了革命思想，冯便于一九一〇年七月吸收他加入了同盟会，这时邓还不满十六岁。

革命党人在新疆创立报馆，讥弹时政，联络会党和军队，积极从事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来临。邓宝珊先生加入同盟会后，以他特有的爱交朋友、待人忠厚，讲信义的优点，在士兵中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他经常对士兵讲论国家大事，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和卖国行为，宣传用革命拯救中国的道理，这时他已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信徒了。

三、参加起义， 持枪杀敌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震撼了全国。湖南、陕西首先响应，建立了革命政权；其它各省也接着纷纷宣布独立。在全国革命形势推动下，甘肃省的陇东、宁夏（今银川，当时归甘肃省辖）及河西等地接连发生革命起义。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给新疆以极大影响，因而很快爆发了以迪化、伊犁为中心的革命起义。这些起义，正是新疆革命党人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

首先是由刘先俊领导，发动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迪化起义。这次起义因为准备工作仓促，敌人的力量过分强大而遭到失败，起义仅仅坚持了两天就被新疆巡抚袁大化残酷镇压了。

伊犁起义是一九一二年元月七日发动的。武昌起义后，武汉革命党人曾发密电给伊犁革命党人冯特民（上海陈其美交俄国领事馆发伊犁领事馆转），要求约期响应起义。冯特民等人考虑条件还不太成熟，未立即发动。就在这时，伊犁将军广福和杭州将军志锐对调，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商定，分别运动新军模范营和游勇，准备立即起义；并给游勇以优厚待遇，令其四出宣传，以动摇军心。这时志锐来到了伊犁，广福交任后尚未离

开。志锐是清王朝的重臣，对武昌起义后调来新疆的新军均表怀疑，便以协标营士兵与武备学堂学生发生斗殴为借口，宣布将杨缵绪部全部解散，遣回关内，以绝后患。另编练满营旗兵，作为清王朝统治伊犁的可靠基础。志锐解散新军，已经激起众怒，却又迟迟不发遣返路费，于是群性激忿，革命党人乘间鼓动，便促成了革命爆发，管理南库军械的黄立中和被遣散的大部分官兵都参加了起义。革命党人公推冯特民、李辅黄为干事，同时决定兵分三路：郝可权带队攻打将军署；冯特民带队攻打北库；李辅黄带队攻占惠远城东门，指挥城外起义部队入城策应。攻打东门是改变城内敌我形势的主要因素，于成败关系最大。邓宝珊先生当时隶属李辅黄部，在革命鼓舞下斗志高昂，手提马枪一枝，共有五发子弹（志锐在新军未正式遣散前，为防止革命，每个士兵只留五发子弹），参加了这一路的战斗。攻打东门的战斗胜利了，城外掩护起义队伍陆续进城，并到南库领取武器弹药。与此同时，将军署也被攻下，志锐越墙逃跑，被捕获伏诛。虽然攻占北库的计划因驻守那里的满营凭栅死守，一时难以实现，但革命党人控制形势的大局已定。后北库满营守军由革命党人邀请广福出面劝告，也停止了抵抗，并缴枪投诚。第二天，临时都督府成立，宣布对清政府独立和实现五族共和，组织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会。在新的革命政府中，原伊犁将军广福被推为临时都督，杨缵绪为总司令部部长，冯特民为外交部部长，其它机构如政治部部长、参议院院长、东进支队司令，也都由革命党人担任，至此伊犁革命政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

四、临危负重， 献策制胜

伊犁起义后，革命党人曾预想争取袁大化拥护共和。结果袁不仅拒绝，反要伊犁方面取消革命，并采取用武力进剿伊犁的军事行动。一九一二年元月伊犁起义爆发后不久，袁大化便派兵遣将进逼伊犁，派陆军协统王佩兰带领马步炮五营陆续进驻四棵树，同时以重兵分别扼守伊犁通往塔城、科布多、阿克苏、焉耆等地的通道，给予严密封锁。布置完毕便命令王佩兰部发起进攻，并以蒙古巴郡王诺贝勒及察哈尔两翼总管训练的马队进行协剿，妄图一举歼灭革命于伊犁孤城。当时形势十分紧急。元月二十五日，伊犁革命党人乘清军还未合围，向东发动攻势，杨缵绪率马步炮五营、敢死队两队直奔五台。这时邓宝珊先生就在这支队伍中。五台守军多为湖北人，与杨有旧识，大部分倒戈投入革命，其余溃散。伊犁军乘胜前进，占领了大河沿、精河，清军张承绪退到四棵树。这样，两军便对峙于精河与四棵树之间。二月初，在精河、沙泉子一带激战一昼夜。邓当时属右翼攻击部队，连长在指挥战斗中阵亡，阵地危急。邓当时即挺身而出，自动担任指挥，坚持战斗，保卫了阵地，表现出了临危负重的勇敢献身精神，同时也说明他在士兵中已具有较高威信。

战斗在继续进行。虽然革命军作战英勇，但因敌我力量众寡悬殊，已感难以支持。就在这时，杨缵绪亲来各阵地督战。邓先生向杨建议采取包抄敌人左翼后路的办法以扭转战局，夺取胜利。杨缵绪很表赞同，当即命令邓率领部队迂回敌后进行突袭。这一行动果然取得成功，使这次战斗转败为胜。

由于起义官兵的浴血奋战，袁大化消灭伊犁革命力量的打算落空，从而促进了革命党人在南疆喀什发动起义的成功，控制了南疆形势，迫使袁大化不得不宣布服从共和。清政府在新疆的封建统治终被推翻。具有伟大历史功绩的伊犁起义，在新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精河、沙泉子战役后，邓以战功被保送到将弁学堂参谋班学习，经过短期训练毕业后即升任参谋。这时他已成为伊犁革命军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军官了。

五、辗转陕甘， 策划讨袁

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一九一三年杨增新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法，破坏了伊犁、喀什的革命起义成果。杨增新以组织联合新政府为名，解除了革命党人的武装；接着便大肆捕杀残害革命党人。冯特民、李辅黄等人及时识破了杨的阴谋，便又积极设法扩充军队，企图挽救革命成果，但因一些革命党人接受了杨增新的拉拢收买，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邓宝珊先生当时也在杨增新的缉捕之列。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冯特民介绍邓先生潜赴宁远（伊犁附城）俄国领事馆，由领事馆发给护照，取道西伯利亚回国，经奉天、天津、北京等地返回甘肃。邓离开伊犁不久，冯特民、李辅黄就被杨增新收买的叛徒杀害了，并以“包藏祸心，意存破坏”的罪名公诸于众。内心阴鸷、善于机变的杨增新，终于用镇压与安抚相结合的手段，扑灭了天山南北的革命烽火，窃取了新疆的统治权。具有伟大历史功绩的新疆辛亥革命就此夭折了。

邓宝珊先生返回甘肃后不久，即去陕西，在华山下与老同盟会员郭希仁、刘蔼如相会，组成共学团；接着又与陕西胡景翼、井勿幕，山西续西峰和续范亭，河北孙岳以及李歧山、刘允函等人聚会于华山脚下的杨家花园，共同策划讨袁。这就是时人称之为“华山聚义”的壮举。此后，他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讨袁、护法诸役，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国理想而不懈奋斗。他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始终是一个积极的战士。

乌 静 彬 传 略(上)

汤 永 才 整理

乌静彬，是和靖的南土尔扈特蒙古王满楚克扎布的福晋（就是王妃）。在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乌静彬在政治上非常活跃，曾是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南蒙古盟长公署副盟长、国民党和靖县党部书记长。在新疆的政治舞台上，在蒙古族中有一定的影响。解放后，笔者曾陆续听过乌静彬讲在解放前的历史经历片断，同时，又参阅乌静彬曾写的部分回忆，现整理出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其中如有失实之处，希知情者指正。

一、家 世

乌静彬，小名代格，一九一四年生于北京。其父名叫贡桑诺尔布，原籍是热河喀拉沁

右旗蒙古族，但长期住在北京，封为亲王，曾任蒙藏院总裁、清华大学校长。

贡桑诺尔布娶了四房妻妾，原配正妻是满族清廷肃亲王的妹妹，未曾生育，但权势极大；二妾是婢女收房，蒙古族，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死了，二女儿名叫孝闻，小名宁格；三妾也是婢女收房，蒙古族，生了乌静彬之后十七天就死了；四妾是汉族，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笃多博，二儿早死，三儿子乌静彬未见过，也不知其名字。

据乌静彬回忆，贡王府在北京故宫后门景山后的太平街。王府的规模很大，有正厅、侧厅，有书房、卧房、上房、下房、门房、帐房、大厨房、小厨房、澡堂、大花园、鱼塘、假山、仓库等等，应有尽有。并分内外庭，内庭住女眷，一般男子不能入内，外庭住男的。贡王府管家佣人很多，男的有二十多人，女的也有二十多人。这几十个人实际上为四个人服务，即贡亲王、大老婆和乌静彬的姐姐孝闻和弟弟笃多博。他们每天吃两餐席，八大盘、八小盘、八大碗、八小碗。吃剩的佣人不能吃，全部进入污水桶。当时，还实行封建剥削的贡品制度，每年春节前，王府规定由热河送二十三车贡品来，贡品中有大烟、猪肉、奶油、奶皮、炒米、炒面等；而且要在年三十晚上到，来早不好，来晚不行，送的人一定要灰尘满身，表示刚到的样子，这就是吉兆。

贡王因为无子，思子心切。其三妾怀乌静彬时，曾算卜问卦，认为是儿子，就对三妾宠爱，为此遭大老婆的嫉恨。后因生了个女儿，就对乌静彬的生母百般刁难迫害；故乌的生母在生乌静彬后十七天就死了。乌静彬为此从小就失宠，备受其大母的虐待，不准接见客人，来客不准露面，甚至姑姑来也不准见；并因小时不懂贵族礼貌，常说些不吉祥的话，经常挨打挨骂。到七岁时送进学堂，念了三字经、百家姓等五本书，九岁时就伺候其大母，天天陪大母进佛堂、上祠堂，替大母梳洗、倒茶、扇扇子。

乌静彬长到九岁，其大母就对其父说：“代格要送出，否则失掉贵族的体面，卖给戏班子叫她唱老生去。”贡王当时不表态。乌静彬的姐姐孝闻当时在家中很吃香，就代乌静彬求情，她说：“不管她怎么坏还是我们家人，卖掉失体面，送走也不像话。如果在前院您烦她，就送我母院去好啦。”大母对孝闻说：“你带她到你母院去是可以的，但这个丫头如果今后给我们丢人你要负责。以后这个丫头确实不成体统需要送走的话，一切路费也由你负责”。

由于乌静彬自小就失宠，她是在佣人老妈子之中长大的。据乌静彬回忆说：这些老妈子一年到头给王府干活，不准回家，每月工资三元（银元），一年四季吃的一种大米饭，白菜汤。王府制度，佣人不准私自买东西做着吃。有一次，新鲜韭菜出来了，几个老妈偷偷合伙买了羊肉、白面、韭菜、油等，动手包饺子。这把乌静彬乐坏了，高兴得乱跑。谁知还是被大母知道了，跑来大骂一顿，把拌好的馅子和合好的面全部倒在垃圾筐里。几个老妈都伤心地哭了。

一九二四年，乌静彬十岁时，她姐姐孝闻对大母说：“妹妹确实是个不成器的坏东西。”于是，筹了路费（出当一件皮衣，十三元），是年秋天乌静彬离开了北京贡王府，送到热河省赤峰县乌家村。

乌家村是乌静彬父亲贡亲王的老家，属乌梁海骨系。但热河老家姓希，两个老奶奶守着一个儿子，叫希仲和，比乌静彬小一岁。他们既雇工种田，也收租。乌静彬在乌家村，穿着由姓白的姥姥家供给，平时帮助干点农活，挖土豆、割大烟膏、晒干菜等。开始，王府不给供养费，于是乌静彬的姥姥家要把乌静彬要过去。为此，希家对王府讲了，到了第二年，王府就派人到希家看乌静彬，并给了供养费。

一九二八年，乌静彬十四岁那年，希仲和要入中学，准备去北京。乌静彬知道后，哭着向希仲和母亲求情，要求把她也带到北京去。希母心软，就与管家商洽答应她一起进京，但有条件，到京后不准乌静彬出头露面，也决不能让大母知道，乌静彬都答应了。到北京后住在东四吉兆胡同。

到北京后，乌静彬就帮搞家务，同时又看守门户，两个老奶奶经常不在家，到处出去打牌。后来，乌渐渐地博得了信任，连管家买菜等事都交给她来办了，因此也感动了二位老奶奶。她们认为乌静彬将来远走高飞一个字不认识不好，读点书也可以写写信。于是，把乌静彬的十五元一月的供养费拿出来请了一位老先生，教乌静彬读四书五经。这位先生给乌静彬起名静彬，字真卿。一年后，辞掉了老先生，请了一位中年先生，教高小的课程。

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乌静彬读了不少小说。特别是读了《儿女英雄传》后，乌静彬升起了一股要出人头地的思想。在她回忆中写道：“我是一个女子，自小受歧视，大母曾说过，这个丫头要是成材，我把两个眼睛都给你挖掉。因此，我真想快快到新疆去，并希望丈夫（王子）是个白痴、傻瓜，可利用他的财产作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或者希望丈夫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叫别人看看我是多么的有福。”由于父亲的无情，弟弟的可恶，希仲和的流气，乌静彬开始恨男人，有一种强烈的报复情绪。

于皆三是蒙古人，也是贡王府的管家，王府财政大权操在他手。他认识新疆的老汉王，小汉王是在他家生的，两岁时才回新疆。老汉王打听贡亲王有个两岁的女儿，于是送给于皆三很多东西，叫他作媒。乌静彬在热河时，于皆三就托热河王府管家关心乌静彬，拿着小汉王的照片给乌静彬看。但未等到乌静彬去新疆于皆三就死了。于皆三死后，王府的管家为张宪庭。

一九三〇年七月间，新疆派人到北京迎娶乌静彬。大概在去新疆前的一个月，张宪庭突然把乌静彬接到他家，并说：“四格（满语中称王爷的女儿为格格，等于小姐）多年在外受苦，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太不对了。今后就在我家住。和我的女儿一样，你的婚事我都包了。多年受王爷的恩，这一点应该报。”乌静彬一下子就成了贵族的格格。由于过去没有过过贵族小姐的生活，比较粗野，所以有时不免闹点笑话。张宪庭每晚在抽完大烟后，就教乌静彬一个贵族格格要如何走路、吃饭、动作、说话等。如何穿衣，由他的大女儿教。有一天张宪庭对乌静彬交待说：新疆已来人，小王的姐姐二公主要看你。今晚去看戏，我们在东边包厢，他们在西边包厢，你初次见面要给人好印象。你后面陪两个老妈子，你不要动，头也不要回。我们晚些时去。吃水果要吃一点就放下，表示不爱吃的样子。看完戏你要先走，我们跟着你，上车时自己不要去开门，等等。

临去新疆前乌静彬回贡王府告别。当时乌静彬见了她的父亲，没有说什么话。又见了其大母，大母只说了句：“啊！你要走了，穿了洋袄子，到婆家可不要跑了。”关于这个，乌静彬常说她小时候野，一出门坎就跑，没有贵族的气质。

新疆汉王与贡王联姻，汉王出了八千银元的财礼，这笔钱乌静彬说是入了张宪庭的腰包。张给乌静彬做了四季衣服，两个金戒指，一对金镯子。

耐人寻味的是乌静彬临走时张宪庭对她交待四点：一是到新疆后，不能说你在家的情况，要像你所看过的小说那样，照那些最娇最享福的小姐一样去夸耀自己的家庭生活。二是新疆蒙古族都信佛，你去后也要学习经文，信佛，要获得民心。三是新疆蒙古族服装金饰多，去了就穿，穿了有两点好处，第一得人心，第二得钱财。有了金子，即使丈夫抛弃你，

你手中还是有钱。的四是去了多向叔公接近，每天给他叩头。并祝愿你去后生子。如听到你生了儿子，我一定去看你，壮大你的势力。张宪庭还说：“生活就是唱戏，看你唱得如何，要很好的表演。否则你是孤单一人，我是无力帮助你的。”

二、与满汉王结婚

一九三〇年八月乌静彬离开北京，经西伯利亚铁路来到新疆。十月，在乌鲁木齐与满楚克扎布结婚。结婚场面极其豪华，光戏就唱了一个月。

当时满楚克扎布虽然是小王，但没有权。整个王府的掌权者为多活佛，其名叫多布栋策楞车敏，是满楚克扎布的叔公。

关于多布栋策楞车敏这个人物，在蒙古人中有两种反应：一种说他坏。乌静彬、通宝等说多活佛为人阴险，手段毒辣，压制小王，从中捣鬼，后来被金树仁枪毙了，是罪有应得；但乌静彬的儿子满光强说多活佛是个好人，是一个进步人物，一个革新的人物。关于多活佛的历史功过，仍希知情者提供具体事实。

一九三一年乌静彬到和靖的蒙古王府，当时满汉王未掌权，权力仍操在多活佛手里。不久，多活佛对乌静彬开始怀疑，认为乌静彬文化程度不高，从北京来时没有亲人护送；来的一个喇嘛住了一个月，要了一个金手镯走了。但多活佛不久就走了，对乌静彬未加迫害。满汉王对乌静彬是好的。

到了一九三二年，多活佛被金树仁枪毙了，满汉王掌了权。据乌静彬说：多活佛枪毙后，被没收了全部财产，计有白银三十万两，金子千两，马一千匹，牦牛五百头，羊一万只左右。满汉王掌权时，有黄金二十两、马一百匹、牦牛三百头左右。但掌权一年后，马群就发展到五百匹马，羊达到一万只。

也就在这年，乌静彬生了儿子，取名叫满光强。在满光强会走时，根据蒙古的封建制度，由他舅舅出头给孩子剪头发。剪头发要请客，请客要送礼。满汉王采取了全部落请客的形式，全部落牧民都要送礼，于是，大量的马、牛、羊到了满汉王的手里。

满汉王掌权后、变得非常残暴。一九三二年春天，他杀死了五十一名维、回族过路的百姓。后来马仲英的部队来到焉耆时，风声传到和靖，满汉王既害怕又急躁，拿着手枪要枪杀妻子和儿子，准备逃往西藏；经大喇嘛抱腿央求，才改变了计划，把乌静彬连夜送进大山，并于夏天送到伊犁。当时伊犁屯垦使是张培元。乌静彬等去后，张把她当成上宾，给予特殊招待。渐渐地乌和张的母亲认识了，并认了张母为干妈。

到一九三四年，满汉王被盛世才任命为师长、警备司令，住在乌鲁木齐。但他和乌静彬的关系，已经破裂。就在这个时候，西里克出来做工作，一方面安慰乌静彬，帮她出点子，另一方面通过盛世才，对满汉王施加压力。满汉王无法，把乌静彬接到了乌鲁木齐。但到乌鲁木齐不久，满汉王又娶了西里克的小女儿西谋珍。为此，乌静彬彻底与满汉王决裂，分了家。乌静彬分到房院一所，大畜五百，小畜二百，黄金一百两。

三、上学

盛世才上台后，来了一批联共党员在新疆工作。其中王宝乾夫妇认识了乌静彬，帮助她

补习功课，鼓励她上学读书。一九三五年乌静彬考入了迪化女中第一班。

一九三七年，满汉王被盛世才逮捕入狱，七岁的满光强继承了王位，乌静彬于是掌握了全部经济大权。当时，满汉王的全部财产有马七百匹，羊二千只，牦牛五百头，黄金四百两，一万斤地租。一九三八年暑假期间，乌静彬回了一次和靖，换了管家，清点了财产帐目，出卖了一批牲畜，准备了在乌鲁木齐一年的开支。为了表示进步，支持抗日战争，乌静彬捐献了黄金五十两，白银一千两，马一百匹，牛一百头，羊二百只。由于满汉王已被逮捕，乌静彬上学，在乌鲁木齐王府的人不多，开支不大，加上她又不在和靖，因而她借此讨好蒙古族牧民群众，在和靖向牧民说，今后给王子送的钱应该减少，如以后需要会找大家帮助的。

一九三八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朱旦华、张奋英、黄颐等来到女中，并担任教学工作。她们工作勤奋，传播马列主义，开展抗日救国的革命活动，在女中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当时的乌静彬，由于所处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与一般学生不同，加上她的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所以，在女中表现非常活跃，风头十足。她爱演戏，在话剧《雷雨》中演周朴园，当学生会会长及宣传委员、卫生委员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水平的提高，乌静彬渐渐考虑到前途的问题了。据乌静彬自己说：一九四一年，即高中毕业前一年，自己想到选择什么道路。以后怎么办呢？教书吧！我不爱，当医生，不成；只有以自己原有的地位，有蒙古族作后盾，打开自己的局面。趁丈夫还在监狱，儿子尚小，自己可以一手遮天，将来把县制搞掉，再掌握一部分军队，巩固原有的盟长公署，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为此，要培养一批人材，好为自己将来服务。于是，乌静彬就向盛世才申请并得到批准，自费创办了一所蒙古学校。学生从和靖招来，共七十名，分配在乌鲁木齐各小学读书，晚上补习蒙文。吃住费用一部分乌静彬出，一部分由牧区捐献。从一九四一年至四四年，这四年中，这批学生由于在乌鲁木齐水土不服，加上有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死亡不少，到四四年只有三十余名了。除了有六名送到兰州师院继续学习外，其余都解散回去了。

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是利用特务，他对乌静彬当然是不会放过的。据乌静彬说，她自入学后，与同学常天资非常要好，经常在一起吃喝。一九四二年有一天常天资对她说：邱校长（邱毓芳）对你和张玉珍非常注意，你要小心她。她问常怎么知道的，常没有马上回答，经她再三追问，常才说邱给她任务，要每周汇报，又让调查为什么你每年暑假总回和靖。我说你在和靖有家产，儿女小丈夫在狱，不回去料理不行。常又说：“这些话你不要对别人讲。你放心，我决不害你。”

一九四三年，盛世才正式公开反共，投靠国民党。乌静彬当时在女中，她们一共七八十人，去西大楼集体加入国民党，介绍人是邱毓芳。一九四四年，乌静彬被选为区分部书记。

一九四四年夏，在女中快放暑假时，有一天盛世才通过邱毓芳请乌静彬和乔嘉甫全家到他家去吃饭。乌静彬非常害怕，认为是要逮捕她。临走前对王秀珠说：“我和孩子们如果今晚不能回来，你明天给在这里的蒙古族讲讲，叫他们把家给料理一下。”盛世才这次没有逮捕她们，而是要她们回牧区解决四件事：第一，调查谁家有枪，全部没收；第二，没收没有种的土地；第三，宣传六大政策；第四，如有破坏和不拥护六大政策的人，要和当地警察局配合逮捕。乔嘉甫被派到塔城，乌静彬去和靖。临去和靖时，盛世才派了四个卫士跟随乌静彬，明是保护，实际上是监视。乌静彬对这四个卫士，极意笼络，招待极好，所以在和靖大

山中，他们只是跟随，晚上还给守夜。由于乌静彬说的是蒙语，他们都听不懂，未出什么问题。整个过程，当然枪未收到，人也未抓。对乌静彬来说，主要是想要赢得蒙古族的民心，为以后独立一方打基础。一九四四年九月，乌静彬回到巴轮台，由于枪未收到，人未抓上，心中害怕不好向盛世才交待。这时得到盛世才下台了的消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乌静彬就急急忙忙返回了乌鲁木齐。

四、宣 抚

盛世才倒了台，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满汉王成了痴呆的精神病人，这给乌静彬创造了有利条件，她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一九四四年九月，乌静彬从和靖回到乌鲁木齐。为了扩大她的政治影响，显示她的实力，乌静彬立即组织了和靖县代表团，有巴勒登大喇嘛、殷英等二十余人参加，由乌静彬带领向吴忠信祝贺，并献了哈达，送了鹿茸等礼品。乌静彬又亲自拜访了伪警察局长胡国振，保释了满汉王、诺尔布、西联华、道尔吉、尔德尼、却登等。

当时，三区革命军正向东推进，局势比较紧张。国民党为了对付三区革命军的进军，又为了确保南疆，特别是焉耆地区这个南疆门户的安全，要乌静彬去和靖大山宣抚，收复大山，守住山口。这当然正中乌静彬的口胃。乌静彬读了八年书，有了本钱，很想利用吴忠信刚来新疆耍一次威风。另外，借此可以实现其蒙古南部落独立的野心。

民政厅厅长邓翔海出面与乌静彬商洽，任乌静彬为宣抚委员，给了砖茶百块，白糖一箱，哈达数十条和藏香等，还有现款七十万元。宣传的内容是国民党是蒙古族的大救星，没有蒋委员长，就没有你们王爷的地位，王府的权利；还说蒙古人民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是个忠诚老实的民族。

由于和靖大山的部分蒙民已经投奔了三区革命，如何把蒙民招回，守住山口，确保南北疆要道的安全，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乌静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向国民党要枪支，搞武装，有了武装可以巩固其封建的地位和创造今后事业的基础。乌静彬对邓翔海夸口，只要给枪，不但可以招回全部大山蒙古牧民，而且可以协助一同打到伊犁去。当时邓翔海找来了张凤仪，要张带二千人马向三区进攻。事过两天，又改变了计划。邓对乌说：先给步枪一百支，组织自卫队，只要把山口卡住，下一步再商量。邓翔海委派巴生为自卫队队长，委派焉耆付专员纪凤楼协助乌静彬。乌静彬临走又带了尔德尼（蒙文秘书）。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乌静彬到了和靖，住在巴克西胡列（现巴音公社）当德尔喇嘛家中。同时，又从专区要来长枪七十支，组织了三百人的自卫队。一九四五年初，由巴生带队进山，第二天宿营时，晚间被三区的巡逻队包围，全部被俘虏缴械，只有付队长达和天带领六七名士兵逃回。

这次宣抚彻底失败了，纪凤楼也被撤了职。

五、重 庆 之 行

出师不利，全军覆没，使乌静彬很恼火。但她并未死心，叫汉文秘书柴震森写报告，要求再发枪五百支，重新组织力量。一连写了几次报告，没有得到答复，这引起乌静彬不满。

她跑到焉耆营房大骂了一顿，她说成功和失败是兵家常事，我今天用你们几条破枪出了例外，没啥了不起，你们几千驻军成天白吃饭，还自夸失败也是本领等等……。当时纪凤楼也在场，表示赞同。

和靖宣抚失败，纪凤楼撤了职，当了替罪羊。但国民党对乌静彬仍然是笼络。一九四五年三月，乌静彬接到吴忠信的电报，要她去重庆开会。于是，在四月，乌静彬随同吴忠信、邓翔海坐专机到重庆，出席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

乌静彬在重庆前后呆了一个月。她这次重庆之行是第一次，所以活动不多，也没有请客招待，连记者采访也不多说话。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上选举了满汉王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乌静彬只捞到一个三盟代表。会议闭幕后，蒋介石接见了乌静彬。这次会议未能使乌静彬满意，选举的结果使乌静彬更为恼火，她与邓翔海争论，说开会让我来，选的是个精神病者，会我开，委员别人当，对我是开玩笑。同时又把和靖失败后，对重建自卫队一事不予支持的一些不满情绪发泄了一通。

在这次会上乌静彬见了内蒙古和热河的蒙族代表，见了白洁深（蒙古族职员）。这些人给乌静彬介绍了内蒙要独立和日本支持德王独立等问题。由于临来开会时吴忠信对乌静彬嘱咐过，内地情况复杂，注意不要上当受骗，不要与各方面接触，也不要向记者谈话。所以，乌静彬未表态，保持沉默。

六、再次重庆之行

第一次重庆之行，在乌静彬看来，政治上是一次失败，有点丧气；加上三区革命军逼近玛纳斯河，无形中对她又是一种压力。在政治上大干一场的决心未下，举棋不定。这里有一段插曲：与纪凤楼的关系。纪凤楼，安徽人，兵痞出身，能吹会拍。由于一九四四年与乌静彬一起到和靖，与乌静彬相处时间较长，乌静彬看他做事精干，能吃苦，也能迎合她的心。所以乌静彬拿出了七十两黄金，让纪凤楼买汽车，跑卖买，纪凤楼一口答应了。后来，三区革命军进至玛纳斯河对岸，乌鲁木齐顿时紧张起来。乌静彬由于曾与三区对抗过，更是害怕，所以带了两个儿女乘飞机逃到酒泉，再从酒泉坐汽车到了兰州。临行前，与纪凤楼约定，要纪凤楼把老婆孩子撂下，开上汽车到兰州，然后两人带着孩子去延安。纪凤楼也满口答应了。然而乌静彬到兰州后，纪凤楼没有如期到兰州，这使她焦躁不安。乌静彬的情绪被在兰州的乔嘉甫的母亲侯老太太看了出来，侯老太太对乌静彬劝说：你在新疆有权有势，俗话说，“人离乡贱，物离乡贵”，你失去了地位，什么都完了，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于是，乌静彬改变了原来的计划。等到纪凤楼到兰州，向乌静彬述说不能离开自己老婆孩子时，乌静彬大骂他无情，赶了出去，并扬言，只要我乌静彬有权有势，你纪凤楼永远别想在政治上翻身。解放后，在一九七〇年左右，有人说纪凤楼在乌鲁木齐南梁卖酱油醋，不久就病死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乌静彬在兰州买了一所房院，把满汉王接到兰州。这时，国民党中央又通知满汉王去重庆开会。乌静彬以秘书身份，陪同满汉王去重庆。这一次乌静彬与上一次大不相同，政治上相当活跃，与各方面广泛接触，设宴请客，向记者发表谈话，出了风头，使人知道新疆有这样一个蒙古族的女政治人物。

在重庆，乌静彬与从内蒙来的李守信混得很熟。李守信跟陈果夫、陈立夫跟得很紧。李